

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



吕蔚著

安史之乱于历史、于文学都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诗人群体及诗歌创作，对于理解盛唐到大历乃至中唐文学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书将安史之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社会心理的变化、盛唐人口及诗人群体迁移及诗人个案等展开研究，从而解读盛唐诗歌转变的契机、过程以及新变所形成风貌，并进而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不仅填补了某些研究空白，也使对这一转折时期诗歌创作的研究具有了整体性、群体性、社会性。

中华书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

57

吕 蔚 著



I207.209

L900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吕蔚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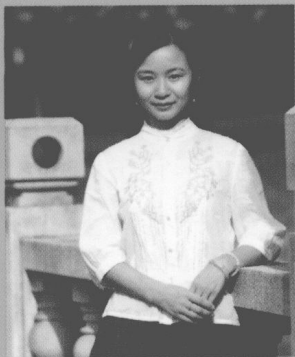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7491 - 8

I. 安… II. 吕… III. 安史之乱 - 影响 - 唐诗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0558 号

-
- 书 名 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
著 者 吕 蔚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½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491 - 8
定 价 38.00 元
-



吕蔚，1977年生，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200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现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曾发表过《唐玄宗后期的政治格局与盛唐诗人的创作》《安史之乱中诗歌创作的多元形态》等近20篇论文，《安史之乱中的京都诗歌创作》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目前，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学的跨文化教学及研究。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
规划 2010 年度课题
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

序

傅璇琮

我刚读到吕蔚同志《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书稿,就想起我于1986年所撰《天宝诗风的演变》一文(刊于《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此文提及,纵观天宝时期的诗坛,不少诗人从开元盛世的光圈中走了出来,面对变化的现实,已感到一种深刻的不安,因此提出:“这种诗化了的深刻的不安,则是天宝诗风的基调。”即不能局限于将开元、天宝为一完整、单调诗风的观念。现读吕蔚同志此书,感到对研究更有进展,特别是盛唐前后历史时期作家群体的形成与消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消落,创作风格的变化,不同文体的代兴,善于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恰当的中介环节,使我们亲切接触到那一时代、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安史之乱于历史、于文学都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诗人群体及诗歌创作,可以填补研究史上的一段空白,因此也将文学史的发展还原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理解盛唐到大历乃至中唐文学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吕蔚同志正是将安史之乱这一使唐代由盛转衰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以动态的眼光从社会心理的变化、盛唐人口及诗人群体迁移上来解读盛唐诗歌转变的契机、过程以及新变所形成的风貌。

要对安史之乱这一时期的盛唐诗人群体及诗歌新变做出整体性研究,首先要从思路上厘清两个问题:其一,合理地截取历史时段作为研究的范围。政治层面与文学层面的历史并不能等同起来,史学家的“盛唐”与文学家的“盛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学范畴中的“盛唐”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范畴,还应当是一个美学范畴。因此,吕蔚同志选取的诗歌创作研究的时段起自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出任宰相,迄至大历七年盛唐诗人群体相继逝世,将安史之乱爆发的蓄积时期及被平定后诗人们仍受战乱余绪影响的九年都纳入了研究视野。

从这一时间段中就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出盛唐诗歌变化的起因、轨迹及新变的风貌。其二,科学地确立盛唐诗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唐代诗人辈出,对于诗人们(如杜甫)分属时期的界定也常有所争论。列入研究范围的诗人要经历过盛世,带有盛唐时代的自信、疏阔等精神特征;经历了安史之乱,切身体会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诗歌创作的活跃期在安史之乱前后一段时期。他们的创作既能体现盛唐精神的延续,又注入了战乱对诗风的影响,显示出新变的特征。可以说,本书对研究范围及对象的界定是符合历史及创作实际的。

在这一思路和基础上,吕蔚同志对安史之乱这一转折时期中盛唐诗人群体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首先,对这一过渡时期中的诗人及创作做出了整体性、群体性、社会性的研究,从而将文学史还原为一个丰富而动态的过程。其次,安史之乱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迁移,盛唐诗人身处移民大潮之中,其迁移的原因、迁移地的选择、迁移过程中的作为、迁移中形成多元的文学创作风貌都是未被学者关注、但又值得关注的问题。吕蔚同志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探究在战乱情况下社会心理的变化、个体不同的心态、人格与价值取向,这些因素使盛唐诗人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开、天盛世不同的新变特征。再次,在战乱中,地域在文化上的凝聚力不断分散、变化,随着全国人口的迁移,盛唐诗人在迁移过程中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创作区域,区域文化对诗人们的创作产生影响,诗人们也为区域文化带来新的内涵,表现出文人与区域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第四,安史之乱打破了唐前期一百多年的太平局面,社会心理在动乱之时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对诗人群体及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吕蔚同志通过对诗风新变的过程及风貌的研究,指出盛唐诗人群体的创作由热情激越趋向冷静凝重;由异彩纷呈趋向单一务实;由阔大高华趋向内敛低沉;由自然灵动趋向沉郁锻炼。文学的创作实际说明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盛唐气象”不但没有立即终结,反而因为时局的变化,在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那些盛唐诗人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只不过他们把“雄壮”“雄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变成了“悲壮”“沉雄”,同样属于“壮美”的范畴,这样就给“盛唐气象”注入了新的历史、精神、文化的内涵。

总之,对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展开综合性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这段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也可以追根溯源地了解文学发展的规律。同时,就治乱对社会心理的影响、社会心理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文学与社

会的相互关系、文人与地域的文化互动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被视为对这段诗歌史的认识深化和价值判断上的新收获。

正因此,通读全书,确有这样一个总感,即:富有朝气而又脚踏实地,立论新颖而又基础扎实。这当是应约作序所得的学术上的欣慰之情。

二〇一〇年六月,北京

目 录

序	傅璇琮	1
绪 论		1
第一章 唐玄宗朝后期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及诗人群体		9
第一节 唐玄宗朝后期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安史 之乱的成因		9
第二节 唐玄宗朝后期社会的文化思潮		27
第二章 唐玄宗朝后期盛唐诗人的心态及诗歌创作		51
第一节 对进身途径遭到破坏的不满		51
第二节 对时局日渐衰落的忧虑		59
第三节 对民众苦难的摹写		66
第四节 对战争的议论		74
第三章 安史之乱中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格局 及文化的转变		85
第一节 安史之乱中唐代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		86
第二节 安史之乱中唐代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变		100
第四章 安史之乱中人口的迁移及盛唐诗人群体		119
第一节 安史之乱中人口的迁移及寄居中心的形成		119
第二节 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迁移		128
第三节 安史之乱中的三大诗歌创作中心		144
第五章 安史之乱中的盛唐诗人群体及诗风新变		159

第一节	由热情激越趋向冷静凝重	160
第二节	由异彩纷呈趋向单一务实	170
第三节	由阔大高华趋向内敛低沉	180
第四节	由自然灵动趋向沉郁锻炼	195
第六章	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个案研究	199
第一节	李白	199
第二节	杜甫	213
第三节	李、杜在安史之乱中诗歌创作的时代意义	233
总 结	241
附录	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迁移的路线	245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55

绪 论

在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中,学术界基本认同高棅把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的观点,因为这种分法从一定意义上厘清了唐代诗歌的发展脉络,表明了唐代诗歌嬗变的过程以及各个阶段的不同创作原则、艺术特点、美学风貌。但其不足在于,这种归纳法只是概括了某一时代最主流的文学创作情况,而对于处于历史过渡阶段、转折阶段的文学现象却只是蜻蜓点水。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这些过渡阶段的研究,从而填补了一些研究史上的空白,也因此将文学史的发展还原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对贞观文坛的研究使我们明白盛唐文学之形成,对五代十国文学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唐文学之延续与宋文学之滥觞。

笔者正是受到了这些启发,想在盛唐与中唐文学之间寻找过渡的契机与轨迹。此前也有学者对这一过渡阶段作过研究,如蒋寅先生的《大历诗风》对大历时期的诗歌作了考察,指出了盛唐与大历诗歌的不同。但问题是,盛唐诗歌风貌何以转变为大历之风?盛唐文学中的一些因素经过了怎样的转换与扬弃而为中唐文学所吸收?显然在盛唐与大历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于是,笔者便将目光凝注在安史之乱这一使唐代由盛转衰的重大历史事件上。这也是本书论述的意义所在。

对于安史之乱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前辈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专门对安史之乱及有关文学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有20篇左右。总的说来,以往的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其一,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安史之乱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个别学者撰写了专门的论文。如清华大学1935年的硕士研究生王忠先生曾写了《安史之乱前后文学演变问题》,他将唐代文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了一番梳理,注意到了安史之乱前后文学的变化。他指

出：“大唐帝国安史之乱前后之变化，自国力言之：前此政令推行于全国，声威远及于四夷。后此则藩镇分割山东，贡赋不入；吐蕃盗据陇右，国门为疆。自种族文化言之：前此尚有相对之调谐，后此则自民族之冲突转入文化之对立矣。自文学演变言之：前此为浪漫文学之时代，后此则为写实文学之时代。故安史之乱不仅于有唐一代之政治史为一分水岭，实亦文学史上之划时代之界线也。”^①王忠先生进而指出“安史之乱于唐代政治史上虽为大时代之没落，于文学史上之光辉则固足以照耀千古也”^②。可以说，这篇文章已经注意到了安史之乱期间文学创作在唐诗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并给其最为合理的定位，可惜这篇文章未能展开，仅仅选取了杜甫一人作为个案来论证安史之乱使文学由浪漫转向写实这一创作趋向，略显单薄。此外，孙学堂先生也指出安史之乱是盛唐文学的分水岭：“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承汉魏六朝之余绪，贯以崭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辉煌气象；后期启宋元文学之滥觞，推陈出新，开辟了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简要概括这个时段的文学精神，我认为前期的特质是‘情感主义’，后期则是‘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交融互补。”^③“唐前期‘情感主义’文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样态：浪漫之思，雄豪之气，清远之境。它的主要载体是诗歌。唐后期在‘情感主义’总体氛围笼罩之下又有所变异的文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样态：沈郁之调，世俗之味。”^④诸如此类，看到安史之乱在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意义的学者不在少数，甚至于学者们在写文章时，凡是提及安史之乱都会缀写两句安史之乱于历史、于文学的转折意义，可惜他们都未能就安史之乱中文学创作实绩给予分析，从而找出其变化的例证和轨迹。

其二，许多学者从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个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战乱对个人生活状态、心理状态、文学创作的影响。近十年左右，在这方面较有影响的论文有十多篇。比如裴斐先生的《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创作》，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李、杜在安史之乱

①王忠：《安史之乱前后文学演变问题》，《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②同上，第39页。

③孙学堂：《中国文学精神》唐代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④同上，第6页。

中不同的经历探讨了其诗歌创作的转变和意义,指出“进入动乱的诗人,王维、储光羲不光彩地受过伪职,后来一个更消极,一个贬死在外。高适在乱中发迹做了大官,这次动乱却没有在他诗里留下明显的痕迹;后来著名的大历十才子,如钱起、郎士元、韩翃都是天宝进士,经历了安史之乱却并没有反映这个时代;知名诗人当中惟岑参、刘长卿留下不多几首描写战乱的作品。正是在别人都已经消声匿迹,盛极一时的诗坛归于沉寂时,李白和杜甫却变得空前活跃,他们一个在黄河流域一个在长江流域,各以其独具特色的诗篇共同反映了这场灾难,不愧为和民族共命运的诗人”^①。此外,肖瑞峰《论李白安史之乱初期的诗作》、许总《论元结及〈篋中集〉诗人的人生态度、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蔡堂根《高适晚年诗歌的心理透视》、李俊标《略论王维安史之乱后的心态》、李利民《安史之乱期间诗坛三大诗人创作之比较》等文章都非常有见地地分析了诗人与时局之间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诗风的转变。此外,一些学者对盛唐重要诗人在安史之乱后的遭遇和经历也作了考证。如郁贤皓先生先后作了《李白生平研究综述》《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对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作了明晰的阐述。对王维在乱后的研究,有陈铁民先生的《王维生平五事考辨》、杨军先生的《王维事迹证补》、毕宝魁先生的《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等,这些都对诗人在此时期的经历作了较详尽的梳理,为本书研究诗人与安史之乱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三,学者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诗风产生了变化。个别学者从历史、政治、文化的维度探讨诗风新变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对安史之乱前后文学创作的研究有了深入的进展。如傅璇琮先生的《天宝诗风的演变》一文,从开元末到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前社会及诗人创作风貌的变化认为这一时期正是内乱的酝酿时期及诗风转变的发端。傅先生指出:“纵观天宝时期的诗坛,使我们感觉到不少诗人似乎从盛世的光圈中走了出来,他们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幻想式的雾气,而逐渐学会用一双清醒的眼睛来看现实,我们发现他们包含诗意的眼神中竟如此的忧郁,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刻的不安。……这种诗化了的深刻的不安,则是天宝诗风的基调。”^②在对天宝时期超脱现实、正

①裴斐:《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第27页。

②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0—91页。

视现实、愤世嫉俗三个创作趋向进行分析后,傅先生进而指出“这种不安却是宝贵的,它们表现了诗人们对时代、对人民的责任感,使诗风有多样化的发展,也预示着我国古典诗歌一个更伟大的发展即将到来”^①。吴相洲先生的《论唐肃宗黜华用实主张对诗风新变的影响》也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他指出“安史之乱对诗风新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学术界对这种影响的分析还显不足,往往只是着眼于战乱使诗人情绪走向低沉这一作用,未能从时人主动调整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方面做深入研究。笔者经过初步研究发现,唐肃宗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一条‘黜华用实’的用人方针,对士人的行为风范主动加以改造,使之由高华走向沉实,进而影响到诗风多项内容的变化”^②。查屏球先生在《江左名士文化与李白晚年悲剧》一文中,从李白具有名士风范入手,分析了他在安史之乱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初盛唐文化是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中对南北文化的整合,盛唐名士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体现,盛唐诗人身上多少都带有名士风范。“我们可以看出以东晋南朝名士的文化意识投身于现实政治,是李白的天真所在,也是他的悲剧所在。他的悲剧实质上是名士文化传统与儒家君臣观念的矛盾。这就如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代表一样,他晚年的悲剧也正是这一文化沉落的典型体现。它传达了一种文化信息:这就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名士风流至此已难以维系。”^③余恕诚先生《杜甫在肃代之际的政治心理变化》一文则从不同皇帝统治和政治特点入手,指出杜甫对于玄宗、肃宗、代宗的不同态度亦是影响其人生选择和诗歌创作的因素。他指出“对于玄宗,杜甫因其曾致开元之治,又自认为玄宗与己有文章知遇之恩,诗中常流露很深的感戴、忆念之情,于其过失,亦多有回护。……杜甫于代宗未曾发生直接联系。代宗即位,杜甫始则寄予希望,后来虽有失望,但规讽之态度,仍然本着谆谆告诫的谏诤之体,自是不乏忠爱之忱。唯独于肃宗,在

①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②吴相洲:《论唐肃宗黜华用实主张对诗风新变的影响》,《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第60页。

③查屏球:《江左名士文化与李白晚年悲剧》,《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第106页。

其统治后期,他的基本态度是不满和反感的”^①。这些从政治、历史、文化角度所进行的透辟的分析给笔者以启发,并从学术方法、学术视野上给笔者以借鉴。

总之,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安史之乱不仅是唐帝国由盛入衰的关键,也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遗憾之处在于学者们只作了散点性的研究,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整体性、群体性、社会性的把握。笔者正是试图对此作一全面的探析。

首先,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时间跨度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限定,从而合理地截取历史时段作为研究的范围。笔者认为,从张九龄罢相李林甫出任宰相(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到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九年(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元结去世,其间跨度为36年的文学都可以纳入安史之乱文学探讨的范围。从起点上来讲,开元二十四年,是唐代政治统治的分水岭,李林甫担任宰相是玄宗朝由“文治”转向“吏治”的标志,此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执政的一段时间正是安史之乱最终爆发的蓄积时期。这一时期内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既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同时也是诗人创作变化之诱因,盛唐诗人觉察到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之后,诗歌创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之乱前所出现的反思、写实等特征才变得明晰起来。从终点上来看,大历七年,安史之乱虽已经被平定9年,但战乱的余绪仍影响着那批走出盛唐的诗人的心态和创作,诸如杜甫、元结、岑参、贾至等盛唐诗人也从未停止过创作。他们曾经历开、天盛世,而战争却摧毁了帝国原有的繁华。战乱虽被平定,但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大大小小的叛乱使他们已经认识到帝国江河日下的趋势,这个时候这些走出盛唐的诗人的创作带有复杂的感情,追忆、感伤、反思、逃避等成为安史之乱平定后诗坛的创作基调。公元769年,岑参去世,次年杜甫去世,标志着盛唐诗人创作的大势已去。公元772年,元结、贾至又相继离去,标志着盛唐诗人这一群体的消失。继而起的大历诗人如刘长卿、钱起等人则标志着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

其次,对这一时期诗歌的探讨必须有一个明晰的思路,同时要为

^①余恕诚:《杜甫在肃代之际的政治心理变化》,《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第43—44页。

诗歌风貌寻找一个改变的背景,即为其改变确立政治、经济、文化的平台。故而,本书的写作将从安史之乱前、安史之乱中、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具体情况入手,通过对诗歌创作实例的考察,来探寻每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特点及与盛世诗歌创作相比所发生的变化。这样,就可以找到使诗歌创作发生新变的深层次的原因,在社会状况与诗歌风气之间架起桥梁,继而深入地分析和认识诗歌创作变化的脉络和走向,尽可能地归纳出文学创作及其风气改变的规律。通过考察,笔者认为,这条线索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安史之乱爆发前社会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危机,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则表现出盛唐诗人对政治格局的体认与思考,对个人穷达的追求与悲叹,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与同情。安史之乱中帝国的权威遭到破坏,战争使社会混乱、生灵涂炭,诗歌创作则表现出盛唐诗人对政治时局及国家命运清醒的反思和写实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盛唐诗人在乱中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由热情激越趋向冷静凝重、由异彩纷呈趋向单一务实、由开阔高华趋向内敛低沉、由自然灵动趋向沉郁锻炼等特征。安史之乱平定后,盛世一去不返,这给诗人们带来了心灵的巨大伤痛,此时,盛唐诗人或痛定思痛,把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结合起来,总结帝国和人生的得失。或移情于山水之中,或回归内心,寻找心灵的解脱。

再次,对盛唐诗人群体的界定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着眼点。唐代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对于其分属时期的界定往往都是研究者争论的问题,如对杜甫究竟是盛唐诗人还是中唐诗人,学者一直都有所争论。要探讨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诗歌创作,必须有一个理论支点,从而分离出具体的可研究的对象。本书旨在探讨盛唐诗人在安史之乱前、乱中、乱后的创作,从他们创作风格的改变来探讨时代精神的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变化。因而,列入本书讨论范围的诗人一定要经历过开、天盛世,有着盛唐时代特有的自信、开放、疏阔等精神特征。同时,他们又经历了安史之乱,切身体会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并且其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也应该是在安史之乱前后一段时期。之所以分析这一群诗人,就是期望能从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找到盛唐与中唐之间演变的轨迹,更细地划分,则是找到盛唐到大历时期文学的走向,从而演绎出中唐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原因。从这个着眼点入手,安史之乱前的盛唐诗人群体从时间上主要指在盛唐时期登上文坛的诗人,其创作活动大多开始于盛唐,且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前后。从创作内容上来讲,他们的创作大多呈现出两个倾向,一是对盛唐时代

由衷的赞美以及对理想充满浪漫色彩的抒写,一是在乱前对时代由盛而衰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现实主义的思考。乱中的创作群体从时间上来讲,就是指从公元755年到763年这八年的战乱期,他们或者被卷入战争混乱之中,或者游离于战争边缘,或者逃避、远离战争,无论是何种方式,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介入到这一时空之中。他们或者抒写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混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或者抒写抑郁的情怀和心情,或者抒发光复大唐帝国的雄心,或者远离战争而躲入自己的思维空间去体会山水胜境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乱后的创作群体从时间上讲则是那些亲历战乱的盛唐诗人,以元结、贾至等人的去世为下限,表明随着盛唐时代的重要诗人相继去世,诗歌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从创作内容上来讲,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带着些许对盛世的念想,同时又带着不得不面临严峻形势的悲凉。

最后,要想勾勒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和变化轨迹,就必须有相应的方法。本书拟用的方法是历史—政治—文化的分析法,意欲在较为广阔的平台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进行较有深度的分析。此外,对比方法的运用也将是本书采用的主要方法,通过不同诗人之间的对比、同一诗人在不同阶段的对比、安史之乱前后的文学与盛唐文学对比等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分析盛唐诗人是如何从盛世中淡出,其创作又如何不再具有盛世的情怀,从而为其诗歌创作的新变找到最符合历史、符合人生的理由和发展趋向。定量分析与绘制图表也是本书尝试使用的方法,这样可以更为直观地表示一些具体情况,主要是自己考察的结果以及援引他人研究成果。